

胡平见:

此次美国之行,来去匆忙,未能与你静下心来深聊长谈,因候州后亦觉有些遗憾。在Boston机场,你和陈军离去时,见你带着孩子的身影,心有所动,生出颇多感慨。你也许在事业上仍含有所成就,但是生活之拥过于紧张、沉重,感情生活更是就消无着。以我偏狭之价值观而言,一个人纵然能成就千秋大业或思想史上的划时代贡献,只要有感情上的苍白和空缺,仍为极失败的人生。不知你假何想,也许你会笑我的情绪化吧。

在Boston找Carma家的迷路之夜,我和陈军宽敞的汽车中有过一次思想的碰撞和交锋,现且回忆起来颇为惬意。关于人的尊严和人为维护自身尊严而反抗的终极意义,确实是个令人困惑而又魅力无穷的问题,穷根下去会进入形而上学或宗教的层次。我的亲身经历是极个人化的,我知道我所持的价值观在目前的中国(也许包括西方)是难以践行或成就的。我的标准太高深、太超现实,逼近人生的脆弱与生存境遇和终极意义上的人生价值,而我又生活在一个平庸的政治现实之中,不能不与之遭遇,我所反抗的东西的平庸性决定了我的所做所为不会具有神圣的价值,至少是匹夫之勇罢了。而你却坚持这种现实反抗的意义,坚持人的尊严的维护是有层次的,是应区别被压迫剥夺之尊严和主动放弃之尊严的区别。我承认你有你的道理,但是作为个人的选择,我不会把这种层级的政治坚持上升到人生终极尊严的高度来观仰。当我被迫从监狱中一切仅限于我的荣辱的戒律时,我不知道我的活下来还有多大意义,不知道坚持政治上的立场还有什么价值。生命的终极尊严的崩溃所带来的一切失望和厌恶,已足以粉碎我的任何坚持和反抗。回头再看卡夫卡的小说,尼采的哲学以及克尔凯戈尔的宗教人主义,方觉在任何社会,都有对人的终极尊严的威胁。人在金钱面前,在性面前,在权力地位以及种种压力面前,很容易放弃自己的尊严,而这种放弃又被一套堂皇的中等阶级的价值观念彻底地合理化了,用是常识中的合理逻辑之是以人放弃生命终极关怀和坚持为前提的。否则,我无权要求任何人认同我的价值观念并践行之,但是人的平庸可以在任何悖论和敌对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合理解释。包括某拉底底人被处死,在世俗的意义上,某拉底底是民主政治的殉教,他应该而且必须被处死,但在人的终极意义上,某拉底底堪称人的典范。加缪说,他必须死为舆论而死,只有自觉活着的无意义,从

而放弃生命才是最真实的死。那么，当一个人的草草且铁窗之内全部被武毁之时，还要坚持一种政治信念，岂不是太可笑了吗？

在世信的定义上，专制社会与民主社会有高低与进身之分，但在超越的定义上，两者没有区别。民主制是一套极世俗、极平庸、极现实的制度设计，是同一大选中又有进身而没有进身。是存在极定义上的价值判断。如果没有宗教、哲学、音乐与诗，什么社会民主了，什么社会就没有灵魂了，民主制的建立不带超越世俗的至信之心，只带世俗化的功利之心。自由之于功利是极其矛盾得好了，而之于人的生存状态，特别在人类生存的意义上而言，则是极为可贵的，能够自由者几乎没有。人类的良知也是不接受任何极定义上的自由。私有财产、选举、言论自由等权利，都是世俗化自由的一部分，而天才、特别在生存意义上的天才是与这一切无关的。只要一个人还要入世，还要期待社会对他的评价，还要以社会的现实标准来确立自身的价值，那他就是自由的囚徒。想之西方建立了近二百年之民主政体，有哪一次选举和操作过程有美之音。关怀终极价值的人是为我而活，关心世俗功利的人是为我而活，两者的差异之不可调和，是伴随人类之永恒学道。一个热重精神上高贵、富有，对超越价值的追求几近身心憔悴的人，无论身在东方还是西方，无论身在专制社会还是民主社会，都是孤独的。承受这种孤独的悲怆在追求超越价值之人身上会转化为一种宁静的自然和自娱。

胡平兄，你知道，我是个太自我中心、太爱自己、太自我膨胀的人，很少有溢美之词加于人。但是对你，一直怀有几分羞于启齿的敬意。记得80年代初读你的发轫之作《论言论自由》，确实深受震撼，其令我起敬之情这且看标题里的第一个现代化之上，且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你是我的启蒙者之一。现在看来，那篇文章的语意仍不会党文化的色彩，特别是结尾处的狂语豪言现在读起来颇有入党志愿书之气势，令人毛骨悚然，但在80年代初，你已有那么警惕的见解，那篇文章且电报上的见地和敏锐，即便今天再看，也这且汗牛充栋的民主斗士的的所有言论之上。你的智慧和坚韧是毋庸置疑的。但我以为，且你赴美之后，特别是且你介入民联事务、接管《中国之音》之后，其思想锋芒已远逊于从前，行文的力量也不复，且触之力，不沉入，更多地纠缠于具体形势的分析 and 海外民运支离破碎的背景，你的智慧和才华被海外民运的超极平庸所束缚了。我常常在想你的角色定位，你一直徘徊于具体事务与做学问、从政与从文、民主斗士和学者之间，故而你的文字也多有游移不定的惶惶。现在，

你仍然无法摆脱这种经济所给你设置的困境，你也许不知，但作为旁观者我却切实地感受到。如单在国内，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的威胁，你的引文再曲折再隐晦，都会有种一往无前的底气，但西方的媒体使你的目标虚化了，你所针对的是一种假想敌，是一种虚拟化的对手。如果你直接针对西方社会一种之重要人的社会文化价值进行批判，就不会有些那情况。是一个自由社会中，在完全安全的情境中，读者能与这隔万里大洋之专制社会对抗，其批判、滑稽以及黑色幽默也许带有一些悲愤和性烈吧。

我回澳洲后写了一篇文章从我的被裁员的政在例，是有关6.4的，已寄给香港的时报周刊，这篇文章是给 Berkeley 的一本杂志的研究报告的“说文字”一章。我自认为此文是到目前为止“6.4”最深入骨髓之文章。希望你找来看看。我想我的自我评价也不会错的。

回国去做的那件事，我一无反顾，无论是基于个人的赎罪、荒凉心的出世，还是基于朋友之谊、国家前途，我都不再会犹豫。我庆幸的是逢上此时的中国，那么的富，那么的危险，那么的刺激，那么的疯狂。如此动荡之乱世而无所作为，实在是太说不过去的了。西方社会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在乱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和之后，也是西方社会又一个黄金时代，而到了今天，西方社会开始平庸化，甚至报也报不了太大的忙，这是一个西方哲子和诗相对寂寞的时期。而在中国则大不一样。投命，我希望你无论如何回国一趟，人生的抉择有时确实是存在主义式的，而不是科学哲学式的。三思而后行的将军万分之一会导致平布。

这是我给你的第一封信，只是编发奇想，提笔乱书，一言可也。希望你读到你的信。如果快一点，在我离开悉尼前你会收到。如来得及，你同样直接寄到下面的地址：

Liu Xiaobo
75 Brighton BLVD
North Bondi
N. S. W 2026
Australia

我5月4号回到5月8号
在过个地址。

Tel: (02) 305912

晓波

93. 4. 21